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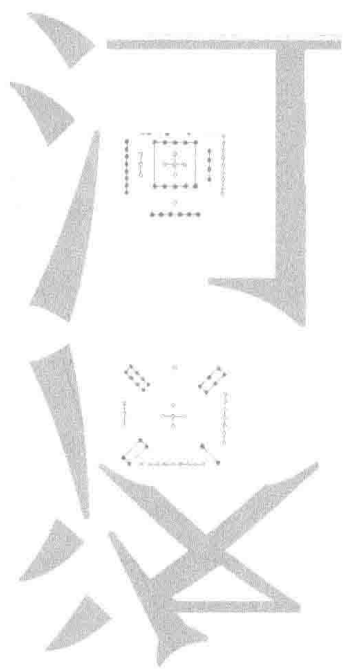


河洛文化研究丛书

周代礼乐与河洛文化

杨海中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河洛文化研究丛书

周代礼乐与河洛文化

杨海中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代礼乐与河洛文化 / 杨海中著. —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8. 2

(河洛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215 - 11333 - 6

I. ①周… II. ①杨… III. ①礼乐—文化研究
—中国—周代 ②文化史—研究—河南 IV. ①K892.9
②K29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27167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6 电话: 65788063)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39

字数 490 千字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71.00 元



绪 论

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

论及中国古代的辉煌,大多人会不约而同地指认秦汉与唐宋,尤其是唐宋,并兴致勃勃地谈起疆域之辽阔,经济之发达,文化之繁荣,等等。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唐宋时期的辉煌为世界发展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至今令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

历史的进步是一个漫长的历程,就我国而言,每个时代,每个地域,都有自己的辉煌,都有时代的骄子,都有创新与发展。“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①便是这个意思。

历史的进步是一条长河,有其源,有其流;长河有时呈现的是涓涓细水,有时则是波涛滚滚、汪洋恣肆。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②我国自黄帝远古至夏代,社会发展在渐变中产生了突变,第一个国家形态夏王朝的出现,使中华文明发生了质的飞跃。殷承夏制,周承殷礼。夏商周三代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三代的辉煌成就至巨至伟,尤其是周代,疆域广大辽阔,“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③典章周备,礼乐涣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全盛时期——“成康之治”,“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④以至使孔子对周公、周之礼乐佩服得五体投地,无限感慨:“郁

① 赵翼《论诗》,《瓠北集》卷二十八。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

③ 诗经·小雅·北山》,《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9月。

④ 《史记·周世家》,《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11月。

郁乎文哉,吾从周。”^①

一、周文化的再认识

考察周代社会与其后历代尤其盛世之联系,不难发现,秦汉唐宋以至于今,虽然不同时期各自呈现蔚蔚不可企及的辉煌,但其源渊多在周,尤其各种思想文化精神之基因不仅主流没有变异与旁逸,而且由于时代精英辈出而膏润优渥,不断得到反复阐扬与膨大,有些虽然面貌及其存在方式有异,但本质上却是一致的,不过是重新刻摹时发生一些需要变化的变化而已。

周文化虽然应指从周人先祖后稷至秦并六国之间的全部文化,但实际上国人所说周文化均指武王克殷之后由周公制礼作乐、后经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阐发创新形成之思想文化和典章制度。周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心态观念、理想诉求,以及所形成的各种典章规范、礼乐制度、人伦原则、道德规范和社会结构。周之后的历史表明,由于周文化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学的源头,因而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整个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周文化的生命力何以弥久而不衰?周文化何以对中华文明发展影响至今?周文化的哪些重要思想构成了河洛文化的核心理念、至今仍在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及观念?本书试从周文化的元典性、人本性、创新性等方面加以梳理与探究。^②

作为观念形态的周文化,以其深邃的原创性而哺育了其后的历代文化,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百姓日用而不知。

“旧邦新命”——传承革新观

《诗经》歌颂周文王因受天命从而王天下之业绩,其中曰:“文王在上,於昭

① 《论语·八佾》,《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9月。

② “文化元典”特指蕴含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典籍,这一学术概念为著名学者冯天瑜先生所首创。元典文化则指由此而产生各种文化形态的元典观念。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

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①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意为周这个历史悠久的小邦国之所以能够统一天下，是因为上天赋予它了革新的使命，从而使它果敢地完成了克商之举。

不言而喻，“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饱含着深刻的哲理与革新精神。

该诗真实地反映了周人的自豪与自信，以坚定的口吻强调并肯定了“维新”。“维新”就是变革，指武王克殷及其后欣欣向荣的新面貌，由于社会发生了变革，才使得“旧邦”气象一新。周人的了不起之处就在于不仅认识到革故鼎新是事物发展的规律，而且敢于“维新”，善于“维新”。

冯友兰先生以哲学家深邃的洞察力敏锐地感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意蕴远大，不仅将其浓缩为“旧邦新命”，并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宏旨出发，明确表示：“中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足以当之。阐旧邦以辅新命，余平生志事盖在斯矣。”^②此语写于1987年8月，冯先生时年92岁。在耄耋之年的哲学家看来，“旧邦新命”内涵无涯，其革新进取的精神具有永久、不朽的普世价值。

“敬天保民”——民本民贵观

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与模式历来都有着动态演化与形态多样性的特征，它通过制度安排、组织形态以及相应的治理机制使这台国家机器运转，并通过随时调整而维系着国家的秩序，推动着社会的发展。然而，不论古代与现代，也不论社会性质如何，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即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作为早期的国家形态，殷商时期仍保留着许多部落或方国联盟结合的方式，与之相适应的思想，就是人们广泛地相信“巫”与“帝”，形成了以“帝”为尊的信仰，一般的人只能由巫祝通过卜筮与“帝”沟通。

武王克商，周公将这一思想进行了改造或者说逐渐地加以颠覆——以“天”高于帝的观念取代了“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对“天”赋予以一定人的意志，

① 《诗经·大雅·文王之什》，《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9月。

② 《康有为“公车上书”书后》，《冯友兰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6月。

提出了“敬天保民”、“敬德保民”的统驭观念。周公用“敬德”赋予“天命”以新的内容,这是周代的一大发明,也是中国古代政权建设的第一次理论创新。从此,不仅“天”在中国哲学中具有了核心地位,民在治国思想中具有了主体地位,德在意识形态中具有指导作用,并且由此发展为系统的“德治”观念和“民本”思想,影响中国二千余年。

周人认为“德”无所不包,它既指天德、政德,也指民德。作为统治者,治国不可仅仅依恃暴力,这是因为,天命无常予,暴力不足恃。有德则兴国,无德必失国。其后的孔子、孟子又据此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提出了著名的“民贵”观,并就政德、民德而提出了“仁政”、“爱人”的价值观。

由此可知,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以民为中心的民本、人(民)权以至民主、博爱的思想,其源头已清楚地显现在这里,它无疑早于西方,早于古罗马。

“明德慎罚”——德法治理观

周人不仅最早提出了“德治”,也提出了“法治”,其纲领性的意见就是《尚书》中的“明德慎罚”。^①

这是周人对前贤治世经验的总结,《尚书》指出,从成汤到纣王之父帝乙,“罔不明德慎罚”。^②

周人所说的“德”是什么?

周代的根本制度是宗法制度。宗法制度的特点是政治统治权利与血缘道德制约双重作用兼备。在此制度下,人有贵贱尊卑,所有的人依“尊尊亲亲”为准则生活与交往。

周代的礼乐制度是将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各种关系固定下来的各种制度与表现形式,是行为文化、观念文化与政治文化融合为一的集中反映。礼乐制度的基础和依据是宗法关系。

周人所说的“罚”又是什么呢?

周人的“罚”就是“刑”。据《尚书》载,周代刑有五种,即墨、劓、剕、宫、大

① 《尚书·康诰》,《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9月。

② 《尚书·多方》,《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9月。

辟,其中的大辟为死刑。“慎罚”的目的是这了社会稳定、秩序稳定。要做到明德慎罚,关键在执法必须慎时度势,做到“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①

周人“明德慎罚”的基本内涵仍是尚德,这是慎罚的基础。因为只有指导思想确立了“敬德”和“人本”,在量刑时才会慎重,才会公平而适中,才不致乱罚与滥杀。

周人“刑罚世轻世重”受到其后历朝历代的重视,求其源,则在于其法理思想的先进性。尤其慎用极刑的人本主张,与近代西方国家主张废除死刑的理念相较,要早出 3000 年。

“修齐治平”——经世致用观

中西方对人生价值的认识有很多不同,其一就是,西方提倡个人主义,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的则是众生整体主义。在西方个人主义者看来,个人是先于社会而存在,因此,他们强调的是平等,强调是个性自由。就今天的视野而论,西方价值观中有许多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的因素,但西方个人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国至上相冲突,因而遭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抵制与改造,其中,“修齐治平”的积极人生价值观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论最早见于《礼记·大学》,^②是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崇尚的信条和最高理想。但透过其丰富的思想内涵人们不难发现,周人最初提出的这一理念却是以“自我完善”——“正心”为其思想基础的。正是在这一伟大历史理性的哺育下,千百年来,中国人无论在内困窘境中,也无无论在外侮的高压下,都能正确处理国家与个人、天下与家庭的矛盾,不仅要求自己具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③而且要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正是以这一伟大历史理性为精神支撑,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贵贱,

① 《尚书·吕刑》,《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 年 9 月。

② 《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 年 9 月。

③ 《孟子·尽心上》,《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 年 9 月。

在国家危亡之际,无不以大丈夫气概高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①以励志,而像林则徐那样,“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②义无反顾地始终不渝坚持“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追求。

“协和万邦”——治国经邦观

一些西方人士对地域辽阔且多民族和谐而存之中国既仰慕又感神秘,尤其对 3000 年前就提出“和协万邦”的理念既佩服又感不解。

“协和万邦”语出《尚书》:“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③

这段称颂帝尧的记载很简洁,但有三点要义不容忽视。其一是简要概括了尧的优秀品质:处事慎敬,谦恭礼贤。由于其个人修养好(克明俊德),从而家族很兴旺(以亲九族),其部族官员都忠于职守(平章百姓),因而他为帝后天下民众团结融洽,国家实力很是强大。这其实就是“修齐治平”人伦政治理想的源头。其二,提出了“协和”的概念并说明它是治理天下最基本的理念和要求,实为“和谐”思想之源头。其三,提出了在协和之下万邦一统的理念,实为中国多民族大一统理念之源头。

世间任何事物都是在运动中发展的,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所谓“和谐”,实质上就是追求平衡。由于周人认识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需要平衡,因而极力倡导人与人、与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发展,“中和”概念的提出,“尚中”观念的确立就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④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理念是“道”,即事物发展的规律,将“中”

① 清人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有“亡国与亡天下奚辩”一段论述,梁启超将其概括为“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痛定思言·三》。

② 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林则徐在伊犁》,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年 10 月。

③ 《尚书·尧典》,《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 年 9 月。

④ 《礼记·中庸》,《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 年 9 月。

视为“天下之大本”，将“和”视为“天下之达道”，可见周人对“和谐”认识极为深刻。同时周人还明确提出，“和”虽然为天下之达道，但它也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节”，即按照原则。“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①“不以礼节之”——失去原则的“和”是不可取的，由此又可见周人是何等的睿智。

周人高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对“率土之滨，皆为王臣”感到自豪，并提出了实现天下“万邦”大一统的“协和”主张。中华民族的非凡气概从此形成，各民族携手共进的统一局面的价值观从此奠定。这里，“万邦”既指域内各部族，也包括域外各友邦。

3000年来，“协和万邦”理念对中华民族的融合与成长，国家的兴旺与统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凝聚作用。同时，由此产生的“和平友好，以邻为善，以邻为伴”思想也成了我们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2007年2月7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发表重要演讲时就引用了“协和万邦”一词，他说：“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主张强不凌弱、富不侮贫，主张协和万邦。早在600年前，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率领庞大船队4次到达非洲东海岸。他们给非洲人民带来的是和平的愿望和真诚的友谊，而不是刀剑枪炮和掠夺奴役。”^②

周文化博大精深，孔子慨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实出内心由衷。周文化既有对远古唐尧虞舜夏禹商汤文化的传承，更多的则是文王武王及周公时代的创新，从而形成了一整套日臻成熟的政治文化理念。

尊重祖宗，慎终追远，面对未来，勇于创新——这就是周人和周文化智慧的奥秘。

今天，中国正迈向现代化的民族繁荣之路，“协和万邦”这盏智慧明灯虽然古老，但其光芒仍然四射，照耀着未来的征程。

二、周文化在求新求变中成熟

任何时代都存在着文化现代化的问题。所谓“现代化”，就是跟随时代发

^① 《论语·学而》，《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9月。

^② 胡锦涛《加强中非团结合作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人民日报》，2007年2月8日。

展、与时俱进,反映时代精神。

只有与时俱进,才能不断获得活力,才能不断成长和壮大,也才不至灭亡。

周承殷制,但其可贵之处在于能够突破旧制,标新立异,独树一帜,且起点很高,视野极阔,相当“现代化”。

周人和周文化何以能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寻找它的底蕴,发现它的动力,一代又一代的学人都在思索,并从中得到了启迪。

“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方法。

众所周知,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的问题,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问题。了不起的是,3000年前周人就总结了人类社会生活的经验,诞生了中国哲学的奠基之作《周易》,系统而全面地讨论了如何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诸类问题,并提出了一个准则,那就是“变通”：“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①

这里,周人不仅认为“变”、“通”是圣人化天下之根本大道,而且这种变通是“往来不穷”的,没有止境的,不能停顿的。周人坚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②正是这不穷的“变”,才使世界日新月异,弃旧图新,生生不息,成为永恒的存在。

周人认识到,世间的一切事物,不论有形的或无形的,其发展、前进到了极限时,就会发生变化,以新的方式和路径前进,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易》就是解说“易”的学问,不明白“易”,便无法游刃有余地面对社会。因此,聪明的人应懂得权变,权变就是智慧;能张则张,该弛则弛,宜伸即伸,不宜则屈。由《易》所传达的我国古代这一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实为构成中华民族哲学的基础,令今人不仅感佩不已,同时也从中得到启迪。

“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

人有主观能动性,这是人与其它动物的根本区别。人可以认识世界,也可以改造世界,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这就需要人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

① 《周易·系辞上传》,《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9月。

② 《周易·系辞下传》,《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9月。

动性。

3000年前的周人不仅意识到了人的能动性,而且非常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①就是周人为自己立下的信条和座右铭,是周人积极的人生态度之最简练的概括。

“天人合一”是周人的人生观。天的运行是雄健的,大道无限,要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人就必须有自强不息的品性、宏远的追求、理想与现实统一的历史理性。

“自强不息”是一种崇高的人生信仰,相信自我,相信现实,也相信未来,因而也相信主、客观是可以统一的,物、人是可以合一的。

“君子”是古人对有知识、有智慧、有作为之士的泛称。古人认为,君子应知天时、顺天道、任人事,以“天”的健行精神时时激励自己,以“人”自强不息的奋斗贡献于社会。

由此可知,自强不息是哲学的大智慧,是民族的大智慧,是凝聚社会、提升自我的大智慧。正是有了这一文化的自信与自觉,华夏文化才得以代代传承,不断创新,不断获得新的活力而保持着勃勃的生机。

自强不息不是凭空获得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②

在周人看来,凡君子,必有高尚的道德,如同大地一样具有宽广绵厚的胸怀,如同大地一样以深厚之德载育万物。孟子对此非常认同,他认为,正是基于有此“厚德”,君子才能够不为外界环境所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③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命脉,千百年来,激励着无数“大丈夫”,为民族、为国家而奋勇前行,并把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传扬到了四面八方。1914年11月5日,梁启超先生以《君子》为题在清华大学作演讲时,希望清华学子“自强不息”,发愤图强:“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曝十寒之弊。……且学者立志,尤须坚忍强毅,虽遇颠沛流离,不屈不挠;若或见利而进,知难而退,非大有为者之事,何足取焉?人之生于世,犹舟之

① 《周易·乾》,《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9月。

② 《周易·坤》,《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9月。

③ 《孟子·滕文公下》,《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9月。

航于海,顺风逆风,因时而异。如必风顺而后扬帆,登岸无日矣。”谈到了“厚德载物”时说:“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①

由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其语有源,蕴涵精深,时过不久,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便将其定为校训并铸入校徽,高悬于大礼堂上方,成为了师生们的座右铭。1925年夏天,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在国学院开学典礼的致辞中提出:中国文化极其博大,后学之任务应是“本中国文化精神”,“寻出中国之魂。”^②无疑,这也是他对校训新的诠释。

正由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集中体现了“中国之魂”,故其超越了历史的时空,至今还闪耀着传统文化理性之光芒。2006年4月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了新西兰,4月6日,他在会见当地华侨华人代表时勉励华人华侨为新西兰的发展作出了更大的贡献。他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们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自强不息、团结包容、吃苦耐劳、勤奋努力的高尚品质,不仅能够在自己的国家创业,还能够世界各地努力奋斗,创造丰硕的成果。”^③

“自强不息”——中国魂,闻之使人感奋,惕砺前行。

发达的“青铜文明”

在我国的历史中,虽然夏朝目前尚缺乏文字印证,但它上承五帝传说时代,下接商、周,是历史的一个重要拐点,因而深入研究夏文化成了历史与考古学界最为关切的事。

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登封王城岗文化遗址的发现,初步打开了夏文化沉睡的大门。学界认为,两个遗址文化代表了夏文化,其中的城及青铜器尤其引人瞩目。

文字、青铜器、城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三项标志。

二里头已有了专门从事青铜作业的铸铜作坊,生产礼器、兵器、工具、乐器和装饰用品等多种类型青铜器,较大型的贵族墓葬中出土的礼器和兵器代表了青

① 《孟子·尽心上》,《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9月。

② 《清华周刊》第20期,1914年11月10日。

③ 《人民日报》,2006年4月7日。

铜器时代初期青铜器的基本模式和工艺水平,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已相当先进。从公元前 21 世纪至公元前 5 世纪中叶,包括古代文献上记载的夏、商、西周和春秋几个历史时代是中国的青铜时代。时间长达 1600 年左右。^①

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不仅是中华文明,也是整个东亚文明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最重要的文化和社会变革的产物。

商代是青铜文化发达的时代,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大鼎,不仅是王权的象征,而且其重达 832.84 公斤,铜、锡、铅比例匹配合理科学,造型设计大气且优美,制作工艺精湛且娴熟,充分表明当时各类生产技术十分先进。

在国外,无论是欧洲各地或是日本,历史上也发现有精美的青铜器,但那里的青铜文明主要是青铜兵器与工具,没有什么礼器和乐器。“器以藏礼”,^②青铜器在三代时期是天子及贵族用于祭祀、朝聘、赠封、宴飨、丧葬等礼仪活动中的礼器,故又称作彝器,因而商周两代青铜器上多有铭文,记录当时王室或贵族的政治事件或家族事迹,这在世界青铜文明史上形成了一道十分亮丽的风景线。如武王灭商时的利簋,32 字,记载武王伐商的具体时间;成王时期的何尊铭文,122 字,记载了成王营建东都洛邑的经过。西周大孟鼎通高 100 多厘米,口径近 80 厘米,重逾 150 公斤,内壁有铭文 291 字,记述了周康王对贵族孟的训诰和赏赐。周代是我国青铜文化最辉煌的时代,它不仅表明当时生产力的发达,也表明中国的史学文明、礼乐文明有着自己的特色,更表明中国的青铜文化在世界上不仅是第一位,也是独一无二的。

任何民族的文明都是以经济为基础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尤其河洛地区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摇篮,7000—6000 年前,这里即有了发达的麦粟生产,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稻粟生产一样,成为了华夏大地的粮食生产区、人口密集区。

河洛地区青铜文明的发达,表明了当时生产力的发达,既是农业经济发达的产物,更是综合文明的集中体现和重要标志。正是由于有此两大文明深厚沃土之哺育,夏商之后的周文化,才得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蓬勃成长与发展。

① 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第 275 页。

② 《左传·成公二年》《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 年 9 月。

三、中国核心文化之基石

河洛文化作为地域文化,2004年至2009年,在河南召开过5次国际研讨会,2010年走出中原,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广州召开了第九届学术研讨会,2011年4月又跨过海峡,在台北召开了第十届河洛文化学术研讨会,2012年10月、2014年6月分别在江西省赣州和福建省厦门召开了第11、12届河洛文化研讨会,2015年10月再次移师台湾,在北新市召开了第13届学术研讨会。

河洛文化的研究何以能引起如此反响呢?河洛文化的突出特点是什么呢?

河洛文化,顾名思义,就是产生在河洛地区的文化。这里的“河”即黄河,“洛”即洛河。洛河源出陕西东南,流经豫西数县,于巩义市北向注入黄河。作为地域概念,河洛地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河洛地区系指以嵩山、洛阳为中心、黄河与洛河交汇形成的夹角地带。广义的河洛地区则指今河南省及其西部、北部近邻的周边地带。因此,广义的“河洛文化”即中原文化。

河洛文化渊源深远。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说:黄河出现龙图,洛水出现龟书,于是,黄帝效法“河图”作“八卦”,夏禹效法“洛书”作“九畴”。“河洛文化”就是指“黄河”、“洛水”一带的文化。^①

目前,虽然给“河洛文化”下一个严格且准确的定义还比较困难,但大体可以这样描述:在河洛地区,导源于远古,产生于夏,成熟于周商,发达于汉魏唐宋,传承于其后历代的文化,它既包括以农耕经济为中心的物质文明,也包括由此产生的政治、经济、习俗、心理等在内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河洛文化内涵宏博。河南大学教授朱绍侯指出:河洛文化博大精深,任何人都难于用一句话把它说清楚。简言之,河洛文化应是产生于河洛地区的,包括原始社会的彩陶文化(仰韶文化)和河南黑陶文化以及神秘而代表河洛人智慧的《河图》《洛书》;还应包括夏商周三代的史官文化,及集夏商周文化大成的周公制礼作乐制度;还应包括综合儒、道、法、兵、农、阴阳五行各家学说而形成的汉代经学、魏晋文学、宋明理学以及与儒道思想互相融合的佛家文化等等,以上各种

^① 汤一介《河洛文化小议》,《光明日报》2001年11月9日。

文化的总和就是河洛文化。^①

关于河洛文化的特点,不少专家对其进行了概括,如根源性、原创性、辐射性、开放性、包融性、厚重性等。其实,作为地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岭南文化、闽南文化、巴蜀文化、陇右文化等,何尝没有上述特点呢!

所谓特点,应是独具的。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河洛文化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影响深远是河洛文化的一般特征,内容的元典性、内涵的核心性及传承的连续性是河洛文化的典型特点。

内容的元典性。

所谓元典性,其内涵有二。

一是具有根源性。研究表明,河洛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具有肇始与母体的地位。世界思想史学界认为,公元前8—4世纪前后,东西方共同出现了一个奇特点现象,即诞生了一批贤哲,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的周公、老子、孔子,古印度的释迦牟尼,犹太教的先知等,他们出于对人类文明的总结所提出主张和原则塑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影响着其后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与生活,促成了今天的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等不同的文化形态,如柏拉图提出的“理想国”,孔子提出的“大同”,释迦牟尼提出的“天国”等。河洛文化不论其反映的史前文明,也不论其对有文字记载以来文明的论述与概括,都充分体现了时代精神,而且具有跨时代的超越性,至今仍被人们称道或借鉴,以至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与自觉。

二是具有鲜明的原创性。河洛文化中的诸多文化元素,不论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道德的、法律的、逻辑的,也不论各种官方的或民间的制度建构等,均对构建整个中华文明体系发挥了筚路蓝缕的开创作用。同时由于它地处“天下之中”,长期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因而其辐射能力极大,辐射范围极广,影响能力极强,从而使很多地域文化都烙下了河洛文化的印记,具有河洛文化的某些特征,也使有些文化成了其亚文化,如客家文化。

内涵的核心性。

所谓核心性,一是具有基础性。在中华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河洛文化长期处

^① 杨海中《河洛文化与闽台文化·导言》,《河洛文化与闽台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

于主体与主干的地位,虽经民族融合,百代发展,其基本理念一直是贯通的。比如农本理念,天人理念,民本理念,厚德理念,宗法理念等,虽然唐宋明清历代面貌有异,外延不断拓展,但其万变不离其宗,其内涵仍是三代时所形成的初始理念。又如道教,虽然派别不一,但都是以奉老子《道德经》为本的。二是终极性。在中华文化中,不论哲学本体、人的价值观,也不论人的宇宙观,都涉及人、自然、社会三者的关系,它要解决或解释的是人在发展中如何处理与自然、与社会的内外矛盾等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述观念在河洛地区形成后,不仅毫无时限地指导、引领着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军事等问题解决与发展。其天人观、义利观、德法观、和合观、家国观、荣辱观、尊卑观、大同观等,虽历经时代变迁,沧海桑田,或升或沉,但至今还保持着它的完整性,体现着终极的关怀。其中,有的成了民族的意识形态,被全社会所认同;有的成了评判是非善恶的准则,被视为行为的规范;有的成了人们的追求与愿景,薪火相传为之奋斗。

研究表明,河洛文化中的上述理念,千百年来不仅一直是人们尊奉的精神准则,而且也在身体力行,并不断地对其加以丰富与发展。近代以来虽然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冲击,但在山呼海啸中,它仍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傲然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传承的连续性。

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1923年,瑞典地质学家在发现仰韶文化之后又在甘肃省临洮县发现了马家窑文化,出土的大量花纹绚丽的彩陶表明,公元前3700年前这里的农业、手工业就相当发达。20世纪30年代中期,考古学家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发现了良渚文化,城墙的发现表明,公元前3300—公元前2300年间,这里不仅农业发达,而且有可能出现了城市,曾闪现出了“文明的曙光”。此外,精美无比、重达6.5公斤的大型玉琮也使人感到深深地震惊。20世纪30—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广汉县发现了三星堆文化,年代为公元前4500—公元前1000年。大量青铜器的出土以及文字符号、祭葬坑及城址的发现,震惊了海内外,并充分说明,3000多年前这里的文明就相当发达。20个世纪8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辽河上游流域发现了红山文化,研究表明,公元前4000—公元前3000年间,这里的农业、畜牧业相当发达。出土的大型碧玉C型玉猪龙重达1公斤,雕制十分精美。